

贸易开放、国内市场化进程与资源误置

——基于系统 GMM 的经验研究

田荣华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作为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企业存在着明显的资源误置现象。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集,通过系统 GMM 方法估计地区与行业的贸易开放水平、国内市场化进程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发现:地区贸易开放水平对资源误置率有倒 U 型影响,拐点水平为 34.85%,且地区贸易开放水平达到 24.39% 后行业贸易开放才会对资源误置程度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地区市场化进程显著地降低了资源误置程度。这一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正确理解对外贸易与国内市场化进程在资源配置效率中的作用。

关键词:贸易开放;市场化;资源误置;系统 GMM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15)02-0103-07

一、引言

作为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大国,中国面临着劳动力、资源、环境等多重约束,经济增长方式应当从粗放式增长向内生性增长转变,由过去依靠要素投入转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体现的是不能被要素投入解释的那部分产出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创新驱动、科技进步以及专业化分工等。近年来,学者们研究发现,除了科技进步以外,资源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也有较大影响。在与中国有关的研究中,Hsieh 和 Klenow(2009)认为中国存在严重的资源误置(resource misallocation),如果以美国作为参照基准的话,仅仅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可以使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 30%~50%,这为其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1]。

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朱喜等(2011)基于 Hsieh 和 Klenow(2009)的模型,运用 2003~2007 年中国各地区农村固定跟踪观察农户数据研究资源误置与农业生产率关系时发现,各地区农户要素配置的扭曲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在技术因素之外,如果能够有效消除资本和劳动配置的扭曲,农户的农业产出有望再增长 20% 以上^[2]。李静等(2012)在检验了 2007 年中国 30 万家企业 TFP 与要素误配指数及总体资源误配指数间的关系后得出,如果有效消除资本和劳动资源的误配,全部工业企业的总量 TFP 可提高 51% 以上^[3]。袁志刚和谢栋栋(2011)在分析中发现劳动力误配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的

收稿日期:2015-01-24

基金项目:霍英东教育基金基础性研究课题“地方保护与中国企业出口行为”(141083)

作者简介:田荣华(1986—),女,黑龙江牡丹江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平均效应损失大约在 8% 左右^[4]。邵挺(2010)利用 1999~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从金融误配视角研究了企业所有制结构与资本回报率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如果消除金融误配现象,中国 GDP 增长量可以提高 2%~8%^[5]。这些实证研究结果都表明,中国的资源误置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事实上,资源误置并非中国经济发展特有的现象,而是广泛存在于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

为什么会产生资源误置?理论上,如果市场制度健全,资源可以自由流动,达到最优配置,将不存在任何扭曲,因为生产率高的企业会兼并或者挤出生产率低的企业,那么所有企业的生产率都应该相等。相反,如果存在市场制度缺失、企业竞争不充分以及其他进入、退出壁垒等,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将会受到抑制,低效率企业仍然存活、高效率的企业也因此无法吸收更多的生产要素,由此产生资源误置。显然,众多因素影响了一国经济体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包括政策干预、企业融资约束、劳动力市场摩擦、企业进入退出效应不显著等。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国际贸易对国内资源配置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 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中,不仅存在企业出口的自选择效应,而且贸易开放也会影响行业内资源配置效率^[6]。企业的出口行为与国内销售行为相比,使企业加入了更大范围的竞争,竞争压力加大。一方面贸易开放提高了企业的存活门槛,那些低效率企业在更为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压力下只能选择退出,从而使得生产要素从这些企业转移到更具竞争活力的高效率企业中;同时,出口企业在“出口中学”效应、技术外溢等条件下,提高企业生产率,最终提高了整个行业的生产率水平。根据 Melitz 模型的结论,我们可以预期与封闭经济相比,贸易开放可以通过加剧市场竞争、促进资源配置从而改善贸易参与国的生产效率。在对我国的研究中,苏艳(2010)在探讨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结构变迁与生产率增长的关系时发现,出口对我国中、高技术的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的资源配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7]。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国内市场化进程的作用。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政府干预的减少,价格信号将反映要素的真实供需关系,无论产品市场还是要素市场的竞争性和流动性都将提高,价格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出口贸易不断扩张,不仅推动了宏观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而且在劳动力就业、技术研发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在以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贸易开放程度与国内市场化对资源误置的影响,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参考。本文的研究思路为:首先,通过 OP 方法测算工业企业生产率,并以企业生产率离散度作为资源误置程度;其次,通过系统 GMM 方法分析地区贸易开放与行业贸易开放水平对资源误置程度的影响,并分析在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中,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是否产生积极的互动。

二、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实际测算

在市场充分竞争状况下,要素资源会从低效率企业转移到高效率企业,最终达到国内资源的最优配置。在不存在任何资源误置的理想状态下,应该可以观察到所有企业的生产率趋于一致。因此,企业之间全要素生产率的离散度也就成为测算资源误置程度的有力工具。目前,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主要有 Levinsohn-Petrin 法(简称 LP 法)与 Olley-Pake 法(简称 OP 法)。与 LP 方法相比,OP 方法的优势在于考虑了企业进入与退出行为对生产率的影响,能够克服样本选择性偏差,因此本文采用 OP 方法来测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此外,OP 法假定企业根据当前企业生产率水平做出投资决策,并假定企业投资决策是生产率、资本和中间投入的函数,解决了同时性偏差问题。

本文采用的样本源于 2000~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参考聂辉华和贾瑞雪(2011)测算 TFP 的过程^[8],本文选择销售收入作为产出变量、全部职工数为劳动投入、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为资本投入,并根据永续盘存法设定折旧率为 15% 计算了投资变量,作为原始的数据样本。参考以往文献的通常做法,我们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来剔除异常观测值,包括关键财务指标缺失、总资产为负或为 0、利润率大于 1 的样本。一般在计算 TFP 时,是将所有行业的数据混合在一起应用 OP

方法计算,而本文认为不同行业在生产过程中有着不同的特点,应该以行业为单位来计算企业的TFP,所以本文以30个制造业行业为单位分别应用OP方法来计算TFP。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本文是根据企业TFP的离散程度来测算行业内资源误置率,我们参照Hsieh和Klenow(2009)的做法,删除了前、后1%分位数的观测值,以排除异常观测值对TFP离散度的干扰^[1]。在运用上述标准进行数据筛选后,我们最终得到1660037个企业TFP的样本值。

基于筛选后的原始数据集,我们分别计算了31个省市以及30个行业(基于国民经济二分位行业代码)2000~2007年的TFP标准差,以此表示资源误置程度DTFP。结果显示,2000~2007年间的DTFP均值为0.5954。类似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资源配置效率也表现出较为显著的地区差异。表1给出了全部31个省市2000~2007年的DTFP均值,其中,浙江省的资源误置率最低,其DTFP均值仅为0.3702,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之相邻的江苏省次之,DTFD均值为0.4647。资源误置最为严重的是西藏地区,DTFP均值在样本期间高达0.7919,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甘肃、青海等西部省份也都呈现较严重的资源误置现象。总体而言,东部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要优于中西部地区。然而,需要关注的是北京与天津这两个城市的资源误置率出乎意料的高,其均值分别达到了0.7600、0.7233,接近西部地区的水平。这一结果可能反映了这两个城市的地理区位特征:一方面聚集了很多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总部与研发机构,另一方面也包含了一些生产率较低、技术附加值不高的服务配套行业,导致企业无论在生产规模还是技术水平上都有着较大差异,结果导致较高的资源误置率。类似地,这一情况同样出现在上海,其DTFP均值(0.6533)显著高于邻近的江苏与浙江两省。

表1 我国资源配置效率的地区差异

地区	DTFP 均值	地区	DTFP 均值	地区	DTFP 均值
北京	0.7600	安徽	0.5315	四川	0.6326
天津	0.7233	福建	0.5639	贵州	0.5571
河北	0.5760	江西	0.5766	云南	0.6580
山西	0.5809	山东	0.5684	西藏	0.7919
内蒙古	0.5806	河南	0.5743	陕西	0.6331
辽宁	0.6096	湖北	0.6742	甘肃	0.7238
吉林	0.6285	湖南	0.5140	青海	0.7181
黑龙江	0.6492	广东	0.5334	宁夏	0.5329
上海	0.6533	广西	0.5910	新疆	0.5660
江苏	0.4647	海南	0.5128		
浙江	0.3702	重庆	0.5520		

从行业资源配置效率来看,低技术或中低技术行业的TFP离散程度较小,如化学纤维制造业(0.3497)、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0.4135)、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0.4320)、造纸和纸制品业(0.4321)。这是因为这些传统行业的技术含量普遍偏低,在同一行业内不同企业的技术水平较为接近,于是其生产率离散程度较小。与此对应的是,技术水平较高的行业其生产率波动越大。例如,高技术行业医药制造业的DTFP均值为0.9705,属于中高技术行业的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的DTFP均值也达到了0.6410。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中国这样资源误置现象较为突出的发展中国家,其内部不同地区与不同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此,我们关注地区与行业的贸易开放度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这也是后文的研究重点。

三、贸易开放、市场化进程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一)估计模型与指标选取

本文主要目的在于检验贸易开放水平对资源误置程度的影响,这一研究的难点在于贸易开放程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存在内生性。一般处理内生性的方法是选取适当的工具变量以减少随机项和内生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然而很难找到与贸易开放相关又与资源误置程度完全不相关的工具变

表 2

我国资源配置效率的行业间差异

行业	DTFP 均值	行业	DTFP 均值
农副食品加工业	0.5740	化学纤维制造业	0.3497
食品制造业	0.5146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5984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0.566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5005
烟草制品业	0.4880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4135
纺织业	0.5525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4438
纺织服装、服饰业	0.6688	金属制品业	0.4382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0.5753	通用设备制造业	0.5980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4320	专用设备制造业	0.5029
家具制造业	0.4918	汽车制造业	0.4981
造纸和纸制品业	0.4321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0.6410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0.4342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6156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0.7041	仪器仪表制造业	0.7425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0.8153	其他制造业	1.1865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0.6299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0.7479
医药制造业	0.9705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0.7943

量,因此本文选用动态面板模型的广义矩估计(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来解决这一问题。系统 GMM 估计法可以利用内生解释变量的水平值和差分值作为工具变量来克服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而不需要寻求其他的工具变量。根据以上分析,建立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如下:

$$DTFP_{ijt} = \alpha_0 + \alpha_1 DTFP_{ijt(t-1)} + \beta_1 Open_{it} + \beta_2 Open_{jt} + \beta_3 Open_{it} \cdot Open_{jt} + \gamma CV + \epsilon_{ijt}$$

上式中 $DTFP_{ijt}$ 为第 i 个省份第 j 个行业,在 t 年的所有企业 OP 生产率标准差,即资源误置程度。在贸易开放度指标选择上,以往研究中经常采用的贸易依存度、实际关税率等指标均是国家层面的数据指标,而本文采用的是微观企业数据,目前我国国际贸易主要集中在加工贸易上,且各企业出口规模存在较大差异,若以企业出口规模作为贸易开放度指标,大规模的加工贸易企业将在回归中起到较大的作用,其他类型的企业,如高技术附加值但贸易量较少的企业的贸易行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将被削弱,为了体现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本文选择出口企业数占全部企业数比重作为贸易开放度的衡量指标,其中 $Open_{it}$ 为 i 省份 t 年的贸易开放水平,即 i 省份 t 年的出口企业数占比。类似地, $Open_{jt}$ 代表 j 行业 t 年的贸易开放水平,即 j 行业 t 年出口企业数占比。

CV 代表影响资源误置率的其他控制变量。参照已有文献与本文的分析重点,选择的控制变量有:代表市场化程度的市场化指数 mi_{it} ,市场化程度体现了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的完善程度,较高的市场化指数反映政府干预较少,在开放的宏观环境下,企业会综合国内外市场信息做出生产决策,此时贸易行为会全面地反映企业在面对国际环境时做出的调整,以及贸易行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本文的市场化指数来源于樊纲和王晓鲁所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各年份、各地区的市场化指数总得分^{[9](P259)};代表规模的地区规模 $lmopre_{it}$ 、行业规模 $lmopre_{jt}$,地区规模 $lmopre_{it}$ 为 i 地区 t 年所有企业销售收入之和,行业规模 $lmopre_{jt}$ 为 j 行业 t 年所有企业销售收入之和,为了消除异方差,对变量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代表企业技术发展的地区研发投入 lrd_{it} ,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合计项整理,并做自然对数处理;代表行业竞争程度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HHI_{jt} ,由行业内各个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的平方和表示;所有制变量:国有企业销售收入比重 $state_rate_{ijt}$ 、外资企业销售收入比重 $fore_rate_{ijt}$;代表政府干预的政府补贴收入 $lsubs_{ijt}$,根据各个企业的补贴收入整理得出了各年份、地区、行业的补贴收入,再取自然对数得到;本文同时在估计中加入了地区虚拟变量和行业虚拟变量。

(二)估计结果分析

1.地区贸易开放度与资源配置效率。表 3 首先给出了地区贸易开放度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模型(1)为地区贸易开放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线性估计,结果表明 $open_{it}$ 的估计系数为正,但未能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地区贸易开放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例如,在贸易开

放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中,既有资源误置率较低的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也有资源误置率相对较高的北京、上海等地,而且即使在同一省份内部的行业之间资源配置效率也存在明显差异。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尝试估计地区贸易开放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具体地,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地区出口企业数比重的二次项 $open_{it}^2$ 。结果表明,在估计模型(2)中 $open_{it}$ 的一次项与二次项都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其中 $open_{it}^2$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open_{it}$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地区贸易开放与资源配置效率实际上存在着倒 U 型的非线性关系。进一步测算表明,这一倒 U 型曲线的拐点位于地区开放程度达到 0.3485 时。由此可以看出,贸易开放其实存在“门槛效应”。在样本期内,地区出口企业数比重高于 34.85% 这一水平的省市仅占样本的 11.75%,可见在当前阶段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出口行为会加剧资源误置程度。

这一结果提醒我们,尽管贸易开放可能通过增加国内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但这一机制并非自动生成,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出口贸易的实际背景更是如此。首先是出口扩张中的政策性干预与扭曲,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对出口贸易的高度依赖,政府部门与行政机构为了刺激企业出口纷纷通过减免税收、出口补贴等手段扶持企业出口,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增长竞赛中的倾向性政策扶持做法更是加剧了出口扩张中的政策激励效果。这使得较长时期以来中国出口迅速扩张并非企业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政策刺激与扭曲做法的结果。其次,尽管中国出口贸易的数量扩张迅速,然而其广为诟病之处在于出口附加值不高、技术含量与出口品质低下、依赖低价竞争策略等。这一粗放式扩张模式限制了出口贸易对国内资源配置的调整作用,还导致产能过剩、资源耗费、过度投资等诸多弊端。类似地,包群(2008)在考察贸易开放与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时,也强调这一倒 U 型关系的存在^[10]。在贸易开放初期,在地区整体开放并不充分的条件下并不能立即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反而会产生市场竞争不充分与企业低价恶性竞争等问题;只有当地区贸易开放达到一定的临界水平,即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与地方开放水平的提高,贸易开放才能引导资源配置到高效率企业中。

市场化指数 mi_{it}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资源误置程度将会逐渐降低。根据《中国市场化指数》,在 1997~2007 年间无论从市场化程度总得分来看,还是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展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五个指标来看,我国各省市市场化程度都在逐步提高,各经济主体发展更加自由,本文的结论表明,在这一时期市场确实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稳定的作用。

在其他控制变量中,地区规模 $lmopre_{it}$ 的扩大将加重资源误置程度,表明经济规模扩张并没有带来效率改善,存在规模不经济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各省市加大投资力度,但却并不注重投资结构,产生大量过度投资与重复建设。Otsuka 等(1998)的研究也证实中国的改革的确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但也促使在很多行业中产生了规模不经济效应^{[11](P231-232)}。Young(2000)从统计上证实,中国各地区的工业部门从改革以来逐步显现出生产结构趋同特征,地区间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严重威胁了中国工业部门的盈利能力^[12]。周晓艳等(2009)在对我国 1990~2006 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分解时也证明规模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几乎没有影响^[13]。政府补贴虽然可以提高企业的收入,但政府的介入会降低市场对企业的调节功能,一方面挤出了市场上的原有投资,另一方面政府补贴会使企业产生“寻租”行为,实证结果显示政府补贴会加剧资源误置程度。

2.行业贸易开放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估计模型(3)给出了行业贸易开放度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结果表明,行业出口企业数比重会加剧资源误置程度。方程(4)中行业贸易开放度的二次项和一次项都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说明行业开放程度不存在类似于地区贸易开放程度的倒 U 型关系。

模型(5)是引入地区开放程度与行业开放程度交叉项的回归结果,其中交叉项结果在 95% 置信水平下显著,由此可以看出,行业贸易开放对资源误置程度的作用与地区贸易开放水平有关。由交叉

表 3

贸易开放度与资源配置的估计结果

	(1) DTFP	(2) DTFP	(3) DTFP	(4) DTFP	(5) DTFP
L.DTFP	0.0495(1.41)	0.0649(1.82)	0.0111(0.25)	0.0662(1.90)	0.0555(1.50)
open _{it}	1.016(1.77)	5.935 ** (3.03)			4.462 * (2.56)
open _{it} ²		-8.516 ** (-2.62)			
open _{jt}			1.272 * (2.27)	3.502(1.79)	3.097 ** (2.58)
open _{jt} ²				-3.898(-1.60)	
open _{it} * open _{jt}					-12.70 * (-2.24)
mi _{it}	-0.309 *** (-3.79)	-0.207 * (-2.51)	-0.402 *** (-3.91)	-0.392 ** (-3.11)	-0.434 *** (-3.86)
lmopre _{it}	0.361 *** (4.38)	0.267 ** (3.20)	0.558 *** (4.41)	0.543 *** (3.54)	0.522 ** (2.82)
lmopre _{jt}	-0.0412(-0.76)	-0.00116(-0.02)	-0.0814(-0.42)	-0.0916(-1.55)	0.120(0.64)
lrd _{it}	0.238 ** (2.72)	0.0899(0.95)	0.256 ** (2.88)	0.286 * (2.47)	0.218(1.54)
HHI _{jt}	-27.54(-1.81)	-0.533(-0.03)	11.78(1.05)	-38.04(-1.96)	10.21(0.90)
state_rate _{ijt}	0.0437(1.22)	0.0618(1.78)	0.177(1.80)	0.0575(1.49)	0.114 * (2.41)
fore_rate _{ijt}	0.0947 * (2.10)	0.0586(1.30)	1.289(1.13)	0.0849(1.64)	0.238 * (2.02)
lsubs _{ijt}	0.0398 * (2.30)	0.0600 *** (3.31)	0.0713 * (2.40)	0.00121(0.34)	0.0319 * (2.12)
常数项	-6.440 ** (-2.79)	-4.908 * (-2.26)	-10.01 ** (-2.83)	-9.026 ** (-2.66)	-12.71 ** (-3.05)
行业控制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控制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5533	5533	5533	5533	5533
AR(1)-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AR(2)-p	0.749	0.234	0.235	0.337	0.447
Hansen 检验	0.095	0.372	0.364	0.066	0.090

说明:***、**、* 分别代表估计系数通过 0.1%、1%、5% 显著性水平检验; AR(1)、AR(2) 检验的原假设均为不存在自相关。

Hansen 检验的原假设为工具变量的选择是有效的, 括号中为 t 统计量, 表 4 同。

项可以得出地区出口企业数比重达到 24.39% (= 3.097/12.7) 时, 行业出口企业数比重的提高才能够促进资源误置程度的降低。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地区的贸易开放水平不高, 而只有个别行业一枝独秀, 资源会竞相挤入该行业, 逐渐产生行业内过度竞争、生产过剩, 造成资源配置失效。

从模型(5)来看, 除了市场化指数、地区规模与政府补贴的结果与模型(2)一致外, 国有企业销售额比重与外资企业销售额比重的系数由不显著变得显著。由于大多数国企在建立之初不同程度上都有一定的政策负担, 并非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导致国有企业形成了规模大、拥有资源最多而生产效率低的状态。模型(5)中国有企业销售收入比重 state_rate_{ijt} 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我国的国有企业在资源配置方面并没有起到与其规模相匹配的作用, 再次印证了国有企业效率较低这一现状。

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 不仅解决了企业资本的积累问题, 也使企业获得国外的生产技术与管理方法, 但同时外资也可能会冲击本国的投资。在本文模型(5)中外资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对资源误置程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说明外资企业的销售收入比重越高, 国内的资源误置程度越深, 外资引入对我国资源配置效率起到了恶化的效果。目前多数研究认为 FDI 会促进东道国生产率提升、优化资源配置, 比如 Baltabaev(2014)通过跨国面板实证分析得出 FDI 是技术转移的关键中介因素, 会促进微观企业生产率提高, 同时作者还发现东道国与投资国技术水平距离会显著正向影响 FDI 对技术转移的效果, 即可以认为 FDI 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14]。孙浦阳等(2014)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 实证研究发现 FDI 能显著改善资本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 使得行业生产率提高^[15]。但包群、赖明勇(2002)发现 FDI 在中国只会提高外资企业的生产率, 外资企业对国内其他企业的技术外溢效果并不明显^[16]。那么, 可以认为 FDI 可能拉大了中国外资企业与其他企业的生产率差距, 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模型(5)的结果也证明在这一阶段外资没有对资源配置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进一步的讨论:国内与国外的互动

市场化程度较高, 说明一个地区以市场作为主导, 而政府会较少的干预, 价格能够完全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 企业间趋于完全竞争。此时, 企业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对信息较为敏感, 在面临国外环境变化时会迅速做出反应, 政府的宏观经济措施会极力避免对资源配置产生扭曲效应。若是市场

化程度较低,说明价格机制、竞争机制无法影响资源配置,资源自由流动受限,此时如果发生国际冲击,企业也无法快速做出回应。通过以上各模型可以看出市场化指数在降低资源误置程度上一直起着积极影响,即市场化程度越高,资源误置程度越低。进一步地,我国地区、行业贸易开放程度与本地的市场化程度是否产生交互影响呢?本文的模型(6)、(7)对此进行了验证。市场化指数对资源误置程度 DTFP 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负,可见市场化水平高时资源能够得到良好配置,但是市场化指数与地区出口企业数比重的交互项为正,说明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并没有很好地融合,仍然存在分割,地区贸易开放与地区竞争没有产生互动。行业的出口企业数比重与市场化指数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

四、总结

地区贸易开放与资源误置程度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当地区贸易开放水平达到 34.85% 后,地区贸易开放可以降低资源误置程度。而目前我国大多数省市的地区贸易开放程度还未达到拐点右边的水平。地区贸易开放度同时也影响着行业贸易开放度对资源误置程度的作用,只有地区贸易开放水平达到 24.39% 后,行业贸易开放才会促进资源误置程度的降低。市场化进程对资源误置程度也有一定的影响,市场化程度越高,资源配置效率越高,但是国内的市场竞争与国际贸易开放并没有产生良好的互动。

本文研究结论对我国开展对外贸易与调整贸易政策有一定启示。企业开展国际贸易,不仅面临着本地企业竞争,同时也将面临出口市场企业的竞争。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越大,越可能充分利用企业资源,最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劳动力价格优势推动出口贸易量逐年提高,使我国成为了贸易大国,但国内各地区出口贸易水平差距较大,大部分地区出口贸易水平不高,由于许多方面不完善,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因此对外开放并不一定能够给国内的资源配置带来显著的作用。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经过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互动,让中国企业更多地参与市场竞争,将逐渐改善国内资源配置效率,国际贸易对国内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才会逐渐显现。综上,我国需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扩大贸易开放,强化市场作用,才能获得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

参考文献:

- [1] Hsieh, C., Klenow, P.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4): 1403—1448.
- [2] 朱喜, 史清华, 盖庆恩. 要素配置扭曲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J]. 经济研究, 2011, (5): 86—98.
- [3] 李静, 彭飞, 毛德凤. 资源错配与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 财贸研究, 2012, (5): 46—53.
- [4] 袁志刚, 谢栋栋. 中国劳动力错配对 TFP 的影响分析[J]. 经济研究, 2011, (7): 4—17.
- [5] 邵挺. 金融错配、所有制结构与资本回报率: 来自 1999—2007 年我国工业企业的研究[J]. 金融研究, 2011, (9): 51—68.
- [6] 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 2003, (6): 695—725.
- [7] 苏艳. 出口、产业结构和生产率变动: 来自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的证据[J]. 产经评论, 2010, (11): 5—13.
- [8] 聂辉华, 贾瑞雪. 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与资源误置[J]. 世界经济, 2011, (7): 27—42.
- [9] 樊纲, 王晓鲁. 中国市场化指数: 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09 年报告[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下转第 118 页)